

共产国际的 经验教训

纪念共产国际成立七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人民出版社

75369

D16-53
T

共产国际的经验教训

纪念共产国际成立七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王师誦

共产国际的经验教训

——纪念共产国际成立七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GONGCHAN GUOJI DE JINGYAN JIAOXUN

宋洪训 张中云 主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东光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9印张 200,000字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 - 4,470

ISBN 7-01-000524-9/K·91 定价4.70元

DH92/18

编者说明

共产国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共产国际作为各国共产党的指导中心，领导了本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结共产国际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当代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都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但长期以来，共产国际的研究在我国被视为禁区，成为研究人员不敢问津的敏感领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鼓舞下，共产国际的研究开始呈现出一派新的气象。10年来，国内史学界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对共产国际史的全面研究也作了初步的尝试，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1988年10月，为纪念共产国际成立70周年，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中央党校国际工人运动史教研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聊城师范学院共产国际研究室、安徽大学等单位在合肥联合举办了以研究总结共产国际的经验教训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来自16个省市的70多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并向会议提交了40多篇学术论文，就共产国际历史上的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本论文集收入的文章就是从提交会议的学术论文中精选出来的。由于篇幅有限，其余文章不能一一刊登，尚希作者

谅解。

收入本论文集的文章只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文责由作者自负。

《共产国际的经验教训》文集编委会

1988年12月

目 录

实事求是地总结共产国际的

- 历史经验(代前言)..... 杨永良 (1)
- 试评共产国际的历史功过..... 宋洪训 (4)
- 共产国际的经验教训及其现实意义..... 张中云 (17)
- 试论共产国际的国际主义
- 理论与实践..... 郭庆仕、田永祥 (32)
- 共产国际领导体制的历史教训..... 秦向阳 (49)
- 共产国际与社会主义工人国际..... 曹长盛 (63)
- 共产国际初期和中期统一战线
- 策略评析..... 吴 琼 (78)
- 共产国际对社会民主党的政策
- 及其历史教训..... 杨章明 (92)
- 共产国际历史上的三次策略转折
- 周尚文、程玉海、孔寒冰 (106)
- 试论共产国际的布尔什维克化口号..... 苏品端 (122)
- 共产国际中期左倾策略的形成
- 及其后果..... 孟全生 (138)
- “第三时期”理论评析..... 陈忠雄、孙景峰 (159)
- “第三时期”理论对中国工运的影响
- 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再认识
- 陈石林 (175)

试析共产国际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	
理论对国际共运的影响·····	康瑞华 (185)
斯大林“孤立中间势力”的公式与	
共产国际的“左”倾·····	杨光远、张心绪 (199)
论1928—1929年斯大林与布哈林	
在共产国际的斗争·····	程玉海 (214)
“保卫苏联”的口号及其对中国革命的	
影响·····	陈再凡 (227)
试评共产国际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期间的政策转变·····	张永康 (243)
共产国际和波兰共产党·····	刘祖熙 (254)
论共产国际与陈独秀的错误·····	杨建国 (270)

实事求是地总结共产国际 的历史经验

(代 前 言)

杨 永 良

1989年是共产国际成立70周年。由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等单位共同发起召开的“共产国际学术讨论会”，今天在我省开幕，我代表省委向到会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这次到会的70多位代表中有不少理论界、学术界的前辈和在这条战线上从事多年领导和研究工作的老同志，还有一批中青年学者，共同研讨在现代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成功的经验和教训对当代社会主义实践都有重大影响的共产国际的历史，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学术活动，我预祝这次全国学术讨论会取得成功！

共产国际1919年成立，1943年解散。在这24年中，作为国际共产党人的联合组织，曾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世界上有68个党先后加入了这个组织，使共产主义运动遍及了世界五大洲。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更与共产国际有着密切的关系。过去我们对共产国际的历史研究不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许多理论工作者的努力下，陆续翻译和出版了有关共产国际的历史资料，特别是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的历史资料，同时还出版了有关共产国际的专

著、文集、文献汇编等，使我国共产国际的学术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获得了许多新的认识。我相信，这次全国学术讨论会，必将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取得新的成果。这次会议集中了这么多学者来安徽开会，也将对我省的理论学术活动的开展起到促进推动作用。

对于共产国际的评价，毛泽东同志曾说它是两头好，中间差。共产国际成立的头八年和最后八年，在帮助各国党的建立和发展，宣传马列主义，推进国际共运的发展等方面，尤其是在1935年七大以后为战胜法西斯主义而进行的斗争，都作出了很大贡献，但在中期的八年，却犯了不少错误。国际共运中的“左”倾错误、教条主义以及把苏联革命和建设的经验神圣化的倾向日趋严重，甚至导致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给当代共运产生了许多严重的影响，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后果。但是，无论共产国际成功的经验还是错误的教训，只要我们以科学的态度正确总结共产国际活动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都会成为我们共产党人很可宝贵的思想理论财富。实际上，我们今天特别强调的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各国党必须根据本国的国情独立自主地探索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建设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各党关系上，我们强调必须遵循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和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等等，都是同正确总结包括共产国际在内的国际共运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分不开的。

28年前，即1960年7月，周恩来同志曾在中央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花了两天时间专门向与会同志作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专题报告。在这个报告中，就共产国际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共产国际

的历史经验，曾作出了概括性的评价（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00—303页）。周恩来同志在肯定共产国际的历史作用的同时，明确指出了共产国际的缺点和错误，特别是中期的缺点和错误，这就是：共产国际对各国党的指导远离了各国实际，甚至变成了对各国党内事务的粗暴干涉，使各国党不能独立自主，不能发挥积极性、创造性。周恩来同志由此提出了下面的结论：各国的革命和建设，要靠各国人民自己的实践；要靠各国党自己独立思考；要靠各国自己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研究国际的经验，要全面地看问题；谋求在原则基础上的团结，等等。这些原则在28年前如此明确提出来，是很可贵的。我想，周恩来同志提出的这些思想应当作为我们研究共产国际历史经验的指导思想。当然，这是一个基础，一个起点，作为学术研究，应该在这一基础上深入探索，写出符合历史真实的专门学术著作来。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中共安徽省委副书记）

试评共产国际的历史功过

宋洪训

共产国际从1919年3月成立到1943年6月宣告解散，历时近四分之一世纪。共产国际作为世界共产党组织，领导了这一风云变幻时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它的理论思想、战略策略和方针路线对各国革命都产生过极其重大的影响，甚至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整个国际政治格局也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因此，正确评定共产国际的历史功过，总结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是有极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共产国际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进行活动的。共产国际活动的前期经历了世界革命由高潮走向低潮、资本主义由战后动乱转向经济稳定的曲折过程，而它的后期又面临着和平与战争、民主与法西斯激烈较量的复杂局面。因此，对于共产国际的历史功过必须放在当时的历史范围内来加以考察，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来加以评析，才能得出比较科学的结论。那种认为共产国际一无是处或对共产国际只作消极评价的虚无主义态度是对历史本身的一种简单化倾向。

综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历史，笔者认为共产国际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诚然，当我们谈到历史功绩时，不能从绝对意义上理解，功绩和失误有时是交互存在的，

在同一个问题上既包含着功绩，又显露出缺点和失误，这正是历史过程的复杂性所在。但从总体上看，共产国际在其全部活动中比较突出的历史功绩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右倾机会主义和共运中的“左倾幼稚病”进行斗争。共产国际自成立以来曾经起过国际理论中心的作用，为各国共产党制定了思想理论、战略策略、组织建设等基本原理。当时，在诸如战争和和平、民主和法西斯、民族解放运动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党的建设等重大问题上都作出了比较明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回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还是贯穿在共产国际的理论活动中的。列宁反对机会主义和共运中的“左倾幼稚病”的斗争贯穿了共产国际从一大到四大的整个活动时期，使年轻的各国共产党清除了机会主义的渣滓，避免了某些“左倾幼稚病”，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轨道比较健康地发展。正是由于共产国际的紧张活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得以在世界范围内广泛而迅速地传播。

二、帮助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先锋队。在共产国际建立初期，全世界工人运动蓬勃高涨，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帝斗争风起云涌，但在当时，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还没有自己的先锋队，大多还处于半自发的斗争阶段。就连参加共产国际成立大会的党派和团体，有些还不是共产党，只是一般的工人组织，甚至是无政府工团主义性质的组织。当时，大多数国家只有一些共产主义的派别和小组。在共产国际二大前后的一段时期里，共产国际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帮助各国建立共产党。共产国际曾通过各种方式，有的是把分散的共产主义派别联合起来，有的是将左派从社会党分裂出来成立独立的共产党，有的则由共产国际派出代表帮助建立

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时，共产党（或工人党）已有68个，分布在世界五大洲。这些共产党（或工人党）在国际工人运动和本国的革命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支援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共产国际自成立以来就从道义上、物资上积极声援和帮助世界各地的罢工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共产国际执委会每遇世界各地爆发罢工斗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爆发反帝斗争时，都发出一些声援性的宣言和呼吁书，这样的宣言和呼吁书占了共产国际文献的很大一部分。共产国际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帝斗争和革命运动特别重视，总是给予同情和支援。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和罗易的《补充提纲》奠定了共产国际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战略和策略思想的基础。1920年和1922年先后召开了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和远东共产主义和革命组织代表大会，提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伟大口号，给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以极大的鼓舞。共产国际还竭力把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这两股力量汇合成一支巨大的洪流，来摧毁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治。

四、开展反对战争和反对法西斯的斗争。早在1922年，当国际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开始出现时，共产国际就给予极大的注意，指出法西斯主义危险存在于许多国家，组织群众抵抗国际法西斯主义是各国共产党的重要任务。此后在历次代表大会和执委会扩大全会上都十分强调反对法西斯和反对战争危险的斗争。共产国际七大以前，虽然对法西斯本质的估计和在实行统一战线策略上有些缺点和错误，但总的说来，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共产国际是有很大功劳的。特别是在七

大以后，它支持被侵略国家的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进行斗争，揭露法西斯的侵略本质和战争计划，并通过不同方式帮助一些支部制定策略措施，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和反法西斯人民阵线。无论是在西班牙遭受德意法西斯武装干涉的时期，还是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共产国际都给予了道义上和物资上的很大支援。由许多国家的共产主义活动家和反法西斯进步人士组建的国际纵队在反法西斯斗争史册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但是，上述历史功绩也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共产国际在其整个活动中比较明显地表现出一条“左”的路线，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重大损失。这条“左”的路线是逐步地形成的。在共产国际的前期活动中，已经暴露出“左”倾错误的萌芽，而到中期则发展成为一条“左”的路线。这条“左”的路线既包含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因素，也包含着把苏联的经验神圣化的倾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结合实际，根据各国不同的情况来加以运用。共产国际在指导各国革命时，往往不是根据各国不同的情况，不是考虑到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以至民族的特点，制定出适合于每个国家情况的方针政策，而相反要求各国共产党都根据一个决议、一个指令来办事，这样势必带来了许多难以克服的矛盾，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共产国际长期以来执行的“左”倾路线大致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对世界革命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因此教条主义地把十月革命的经验运用到社会经济结构不同的国家，把联共（布）一党一国的经验推广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来；二、对资本主义自我调整能力和发展潜力估计不足，因此在制定革命的战略和策略时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三、对社会民主

主义传统和社会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估计不足，因此在实行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策略和对社会民主党的态度上表现出比较严重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一、对世界革命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在共产国际成立初期，国际局势确实处于革命高涨的时期，但共产国际领导人没有保持十分清醒的头脑，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很快将从这个国家到那个国家“凯歌行进”，在世界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业已成熟。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杂志创刊号上曾撰文预言：“最终胜利可能会在最近几个月内，甚至最近几个星期内取得。运动发展得如此令人目眩地迅速，以至可以有把握地说，再过一年，我们将会忘记在欧洲曾进行过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因为再过一年，整个欧洲将是共产主义的欧洲了”。^①当然，对形势作这样乐观的估计并不只是季诺维也夫一人，包括列宁在内的其他许多领导人当时几乎都持同样的乐观的态度。由于对形势作这样乐观的估计，因此提出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向世界资产阶级实行正面冲击，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直接提到议事日程上。如果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形势的这种乐观态度仅仅是一种估计上的失误，那么在以后的年代里，特别是当革命已经由高潮转向低潮的时候，对形势的乐观估计就发展为一条“左”倾教条主义和盲动主义的路线了。在1920年底—1921年初，当革命形势明显趋于低落时，共产国际曾实行了策略转变，提出了“到群众中去”、“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口号，随后确立了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方针，并提出“工人政府”和“工农政府”的过渡性口号。这无疑是一次重大的策略转变。

^① 见《共产国际》杂志俄文版1919年第1期第41—42页。

但是，以后的事实证明，这次策略转变是极不彻底的。无论在共产国际领导人中间，还是在各国共产党内，“左”倾势力还是十分强大的。这不仅表现在对统一战线策略的抵触，而且也表现在顽固地不愿放弃“世界革命迅速取胜”的幻想。1923年德国革命的例子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当时共产国际领导人和德共主要领导人都把夺取政权看作是轻而易举、唾手可得的事，夸大了局势的成熟程度，对敌人的力量估计不足。共产国际领导人还企图把俄国十月革命的策略经验生硬地运用到社会经济结构、政治思想状况完全不同的国家里来。德国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没有从中认真吸取教训。到1927年底和1928年六大时，“左”倾教条主义发展到了顶点。当时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形势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形势又作了过于乐观的估计。斯大林当时曾断言，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新的革命高涨的一系列征兆，说明欧洲正在进入革命高潮的新时期。基于这种认识，共产国际提出了各国共产党的任务是：一方面准备工人阶级去迎接即将到来的阶级搏斗，去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另一方面则加强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以保证这一革命的胜利。在这种“左”倾思想的指导下，自然把对形势比较符合实际的清醒估计看作是“右倾”，把提出一些局部要求、满足工人阶级日常需要的口号和措施看作是机会主义的口号和措施。在这段时期里，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左”倾路线也表现得较为突出。

共产国际六大制定的以及随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加以完善的“新方针”和“第三时期”的理论对中国共产党内出现的两次“左”倾路线（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有着直接的重大的影响。1927年，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遭到惨重失败，

党的组织和工农群众运动遭到极大的摧残，革命形势明显转入低潮。但是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中国革命的形势没有作出清醒的估计，认为革命形势很快将继续高涨，革命将进入更高的阶段。在反对党内倾向的斗争上，共产国际一再强调“右倾是主要危险”，这一方面固然是出于联共（布）党内斗争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对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过于乐观估计。尽管在1927年以后，在中共党内的主要错误倾向应是“左”的盲动主义，而到1930年下半年，“左”倾路线的危害已在实际工作中明显表现出来，但共产国际一味强调“右倾是主要危险”，并不顾国情、不分具体情况一再指示中共要“与右倾机会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这是造成中共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左”倾路线一次比一次更为严重的重要原因之一，也使中国革命曾经几乎陷于绝境。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后，中国革命才开始出现了转折点。

二、对资本主义自我调整能力和发展潜力估计不足。资本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经受了动荡和衰落，但从本世纪20年代开始就多少克服了战后的危机和动乱，而走上了稳定和局部繁荣的时期。特别是美国帝国主义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据统计，美国在1921年至1929年期间，工业生产提高了90%，投资率超过了国民生产总值的20%，每小时劳动生产率增长了47%。此后，生产的合理化，新技术的应用以及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都推动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总之，20年代帝国主义经济稳定和局部繁荣的事实说明，资本主义制度还没有耗尽自己的潜力，也并不象共产国际所预言的那样只不过是垂死前的“回光返照”而已。

共产国际经常从资本主义会迅速崩溃、社会主义会立即